

劳工神圣

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视野

闻翔 著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劳工神圣

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视野

闻翔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劳工神圣：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视野 / 闻翔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3（2018.6重印）
ISBN 978-7-100-15905-0

I. ①劳… II. ①闻… III. ①工人阶级—研究—中国
IV. ①D6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0439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劳工神圣

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视野

闻翔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905-0

2018年3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8年6月第2次印刷

印张 8 $\frac{1}{4}$

定价：39.00元

序

沈原

闻翔的大作《劳工神圣》即将付梓，这部书是对民国社会学人的“劳工研究”的一个爬梳和整理。显然，这部书属于“中国社会学史”类别的作品。关于“中国社会学史”，此前，老一辈学者亦有撰述；当下，新一代学者也曾从不同角度加以阐释。但前者多从编年和学人的角度切入，后者则试图从学派活动的角度展开。如闻翔此书，试图立足于社会学的某一专门领域，却似未尝多见。本书将劳工问题放在近代中国学术与政治的双重视野中来理解，对中国早期社会学中劳工研究的思想源流、社会背景、概念发展、学人活动、学术影响等，加以全面和深入的探讨。作者在书中体现出来的眼光与见地，足以令此书成为一部上乘学术作品。

我以为此书至少有四点值得特别关注：

首先是作者关于“重访”方法的思考。作者起首即将此书界定为“重访”研究，论说了“重访”的四个维度：发掘历史线索、提供理论视角、带来新想象和揭示总体性。作者自创的这个“四维度说”极大地拓宽和充实了学科史研究的方法内涵：在此种“重访”的方法论应用之下，学科史将不复是史料的单纯排比、辨别和说明；学科史本身既是理论，又是方法；既回溯过去，又立足现在，更远

眺未来——时间的三个维度被作为一个总体而得以统合。在我看来，作者界定的作为学科史研究方法的“重访”的意义，甚至还要大于他对于书中具体人物和相关思想的描述和解读。

其次是对学科史上那些做出过重要贡献，但已被历史尘埃埋没的学者及其思想的发掘、整理和评价。例如对于苏汝江的研究。苏汝江在抗战时期参与和主持过多项经济社会调查，他所撰述的《云南个旧锡业调查》锻造了产业民族志的独特眼界，即把某一产业的内部结构和制度与地方社会结构、文化风貌的演化紧密结合起来。这种将研究视角扩展到超越单一工厂制度边界的思路，即使对今日的社会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也具有指导意义，可惜久已不为人知。经此书发掘介绍，这一遗珠得以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

再次是对经典学者和经典作品的再解读。费孝通是民国社会学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江村经济》是中国社会学历史上的一块丰碑。学界对《江村经济》等费先生的著作已有大量的研究和讨论，但大多将其放在乡村社会学的脉络中来理解。作者在此书中则将费先生的乡土中国研究嵌入于他对中国进入“机器时代”所遭遇的各种转型问题之思考的大框架中。从费先生认真研究和推介美国早期工业关系研究领域梅岳“人际关系学派”的主要思想，到他组织推动魁阁同仁如史国衡和田汝康的工厂民族志调查，并将《昆厂劳工》和《内地女工》两部研究成果移译为英文出版，直至他晚年对乡镇工业化的种种思考，都被作者仔细考察，连接贯通，从而展示出费先生学术思想中一条不绝如缕的线索：透过工厂制度的奠立和劳工阶级的产生，探讨乡土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重建社会的可能性。对费先生思想中这一典型“涂尔干思路”的再发掘和再阐述，无疑有助于对其学术思想广阔内涵的理解。

最后是对前辈社会学家锻造的若干相关概念的再考察。作者特

别列举出陈达的“中国化的劳工运动”和史国衡的“契合关系”作为例证，说明在民国学者的劳工问题研究中，生成过一些饶有兴味的概念，这些概念源自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经验，即在今日，仍有其学术意义。

总之，作者在书中以沉稳笔法，对陶孟和、陈达、费孝通、苏汝江、史国衡、田汝康等诸多前辈学人的著述和思想一一重访，夹叙夹议，其中多有真知灼见。此书的出版对于中国的劳工社会学，自有其无须言说的重要意义。不过，虽说此书主题是早期社会学的“劳工研究”，但作者却似乎并不情愿把自己的志向囿于“狭窄的劳工社会学”之中。作者反复表明，他的鸿鹄之志是透过劳工，观察经济社会转型。善哉斯言！然而又有哪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的目标不是如此呢？是故，斯言亦何须道哉。

2018年1月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劳工”何以成为“问题”？	16
一、“劳工神圣”的源起与流变	17
二、从“劳工神圣”到“劳工问题”	19
三、劳工问题的社会学意涵	25
四、治理与革命：两个主要问题域	34
第二章 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劳工研究	
——学派、视角与类型学	40
一、劳工研究的“学科化”历程	40
二、劳工研究的学派与谱系	47
三、劳工研究的主要视角	63
四、劳工研究的类型学	83
五、小结	85
第三章 为共和政治探寻民情基础	
——陶孟和的劳工研究及其内在理路	90
一、陶孟和与民国社会学	93
二、劳工作为“生死问题”	96
三、劳工家庭经济及其变迁	102
四、以教育再造“民情”	105

五、小结.....110

第四章 现代转型与“中国化的劳工运动”

——陈达的劳工研究及其理论自觉.....112

一、陈达的著述与学思历程.....112

二、结构、历史与行动者.....118

三、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出路.....125

四、探寻“中国化的劳工运动”.....128

五、小结.....131

第五章 在世界体系与地方社会之间

——苏汝江的矿区民族志与工业转型的动力学.....132

一、世界体系中的个旧.....136

二、矿区的旧秩序.....138

三、血汗制度下的矿工.....139

四、变迁的动力学.....144

五、小结.....148

第六章 企业组织与社会团结

——费孝通与魁阁同仁的工厂民族志.....153

一、史国衡的昆厂研究.....155

二、田汝康的女工研究.....161

三、费孝通的反思：工业文明中的社会团结.....165

四、一个被“中断”的传统.....173

第七章 劳工政治与社会革命

——邓中夏的劳工史研究及其内在张力.....176

一、作为社会学家的邓中夏.....176

二、工人阶级与社会革命.....179

三、邓中夏的劳工史著述.....181

四、早期社会学脉络中的邓中夏·····	191
五、新劳工史的反思与邓中夏的内在张力·····	193
第八章 中国早期社会学传统中的“他者”	
——以步济时和托尼的劳工研究为例·····	200
一、学术史视野中的“他者”·····	200
二、步济时的行会研究·····	203
三、托尼与《中国的土地和劳动》·····	207
四、小结·····	218
第九章 学院体制、学术社群与政治变迁	
——劳工社会学演进的生态史考察·····	219
一、学院体制·····	221
二、学术社群·····	227
三、政治变迁·····	232
四、小结·····	236
结 语 ·····	238
参 考 文 献 ·····	243

导 论

一、研究问题及研究意义

从 19 世纪诞生之日起，社会学就与劳工问题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古典社会学大师中，韦伯早年的一个重要经验研究就是对易北河东岸波兰劳工的调查，涂尔干在其名著《社会分工论》所讨论的“反常分工”首先就是关于劳资关系的，马克思就更不用说了，他在《资本论》及其他著作中对于商品生产和工厂体制的分析，奠定了其整个社会分析的基础。^①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社会学本身即工业革命的产物，古典社会学家对劳工问题的关注恰恰反映了他们所处时代的需求。

与西方的情形类似，自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新兴的产业革命逐渐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与形貌，现代性的各种特征浮现出来：“一方面是工场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勃兴、农村的荒废、手工业的凋落、人口的增加、大城市的发生；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反抗，工场法和劳动组合法的发布、经济恐慌、同盟罢工、失业问题、贫

^① 参见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穷的增加、民主革命的胜利、劳动者的政治运动等。”^①与此同时，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也恰在此时被引介进来且逐渐走向成熟，对劳工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因此也成为中国早期社会学的一个重要面向。

在中国早期的社会学前辈看来，劳工问题构成了理解自晚清以来中国工业化与现代转型的一个枢纽，在讨论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时，劳工问题都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

就“经济”而言，“乡土中国”逐步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随着近代工业技术和工厂制度的传入，农业与手工业互补的传统格局在国际资本和“洋货”入侵的新情势下逐渐瓦解，“机械、动力、大规模生产组织以及随这些现象而来的金融机构等等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开始日渐增强”^②。一方面，旧式的小农经济以及家庭手工业和作坊手工业面临危机和转型，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和企业组织形态得到移植和再造，“劳工”的定义与构成发生巨大变化，产业工人阶级崛起，而传统手工业工人群体则日渐衰落。

就“社会”而言，在“组织”与“家庭”两个中间层面上都出现了显著变化。在“组织”层面上，与旧式手工业相配套的以“劳资合行”为组织形态、以师徒制为伦理基础的行会日渐式微，且逐步向以职业/阶级共同体为内核的现代工会转型。而在“家庭”层面，至少在城市无产阶级那里，传统大家庭已经逐渐为核心家庭所取代，且远离传统的宗族和地缘网络的庇护。

就“政治”而言，从蔡元培1918年提出“劳工神圣”起^③，劳工阶级逐渐走上历史舞台，成为各种主义、党派都试图召唤、动员或

① 李达：《中国产业革命概观》，载《李达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0页。

② 理查德·H.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29—130页。

③ 蔡元培：《劳工神圣——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载《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

改造的一个对象,劳工阶级自身也逐渐成长为社会政治的主体之一,如何安放劳工的位置成为任何政治改良或革命的方案都必须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正如裴宜理所指出的,“20世纪的中国政治领袖在描绘新社会蓝图时均予以工人阶级一种特别的地位。现代化几乎都是产业化的同义语,工人则被视为发展的代表”,“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积极采取措施,将这一不断增长的势力纳入议事日程”。^①

因此,劳工问题不仅仅是一类特殊的社会问题,或只构成一门特定分支社会学所处理的研究对象,而是理解中国的现代转型的一个具有总体意义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劳工问题的研究不仅成为认识中国的一门显学,也构成了此后二三十年间开启学术和政治的不同道路的一个重要起点”^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的社会学前辈将劳工问题视为中国社会革命与社会建设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并展开了大量的经验调查和研究。例如,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中仅有的两位社会学家——陶孟和与陈达,都是著名的劳工问题专家,陶孟和曾就北平工人家庭的生活费问题做过专题调查,陈达则在劳工法和劳工运动等研究领域著述颇丰^③;此外,费孝通、孙本文、史国衡、陈翰笙、田汝康、苏汝江等重要学者也都对劳工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④。这些研究面对那个时代中国本土的劳工问题,积累了大量的经

① 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② 渠敬东、傅春晖、闻翔:《组织变革和体制治理:企业中的劳动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③ 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城市(劳工)生活卷》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陈达:《中国劳工问题》,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④ 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史国衡:《昆厂劳工》,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陈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验素材和数据资料，构筑了独特的理论视角。有人曾作过统计，在1920—1940年代，中国出版的有关劳工问题的社会学著作不下100种之多，内容则涵盖了劳工运动、工会组织、生活费与生活程度、工资与工作时间、工人福利与社会保障、女工与童工问题等诸多方面。^①劳工问题研究也因此成为民国时期社会学最为重要也最富活力的领域之一。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的社会学家在进行劳工问题的调查研究时，大多以西方当代劳工社会学为参考或对话对象，却很少留意早期社会学前辈们的著述。然而，正如涂尔干所说的，“只有在过去当中，才能找到组成现在的各个部分”^②。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当代的劳工问题，我们有必要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现代工人阶级产生的历史情境中，重新梳理学术前辈对于劳工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本书即旨在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入手，重访中国早期社会学对劳工问题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思考，从而重新激活这一“冻结的传统”^③。本书不仅要重访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劳工问题研究的具体著述或结论，还要揭示对劳工问题的研究如何在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和智识背景下逐步发展起来，即对其演变的脉络和逻辑进行考察。

当然，本书的定位虽然是一项学术史的研究，然而其学术意义却不仅仅在于其“史”的面向，更在于其当下的面向。对中国早期社会学的重访恰恰是为了最终返回当下，为理解当代中国的劳工问题与劳工政治提供启发。具体来说，这个重访工作至少具有以下几

① 潘锦棠：《劳动社会学的由来和发展》，《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第69页。

② 爱弥尔·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渠东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③ 成伯清：《“冻结的传统”——中国社会发生学的文化反思》，《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第138期。

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重访”意味着对历史线索的发掘和延伸。尽管劳工问题的形态和焦点在每个时代都各不相同，但一些基本的线索和逻辑却始终如草蛇灰线，潜伏在历史的过程中，若隐若现。换句话说，近百年来的工业化进程本身即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而不能被割裂来看。因此，当代中国的很多劳工问题与劳工现象，实际上都能从1949年以前找到根源、线索或雏形。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社会学界所兴起的农民工研究，其所关心的农民进城变成工人的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和史国衡等人的工厂民族志研究中就得到过深入的讨论。虽然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然而，农民变成工人的内核是“人”的转变、是人所以安身立命的社会团结纽带的转变，就此而言，民国与今日并无二致。再比如，关于乡村工业化的发展模式问题，自乡镇企业在1990年代末的戏剧性衰落起就一直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然而，早在民国时期，方显廷、吴知等学者对高阳、宝坻等地所做的乡村工业的调查研究，就已然在这一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统计数据 and 实证材料。由此可见，重访中国早期社会学，可以使我们在审视当下时获得一定的历史参照，有了这种历史感，今天的研究才可能变得厚重和蕴藉起来。

其次，“重访”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分析视角。西方的劳工社会学理论固然能够为我们确立基本的学术视域和对话平台，然而早期社会学前辈所提出的一些本土化的分析概念和理论解释依然值得重视。例如，陈达在研究工会组织时所提出的“中国化的劳工运动”之说、史国衡在考察“昆厂”中的人事纠纷时所提出的现代工厂中的“契合”关系之说，这些根植于中国自身的经验脉络和历史脉络的概念，直到现在仍然具有生命力。

第三，“重访”带来新的、别样的想象力。中国早期社会学传统

中关于工业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社会革命的种种方案和思考，包括如何对传统进行现代转化，如何“和而不同”、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如何处理劳工政治与政党政治的关系，如何在工业发展中处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议题在当代仍然具有意义。虽然在1949年之后我们走上了一条单向度的、以单位制和再分配体制为核心特征的劳动关系治理路径，^①然而回望和想象过去，却意味着思考另类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在改革近四十年之后形势日趋复杂的今天，正在重新找到其相关性。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重访”揭示了一种总体性、综合性的研究进路的可能性。在当下的社会学研究中，劳工问题往往被视为“社会问题”的一个特殊领域来对待。这自然与中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以来所侧重的应用性格具有内在一致性，尤其是与19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以“问题与对策”为主要取向的农民工研究所导致的路径依赖密切相关。尽管自2000年以后，随着“阶级形成”“劳动过程”等理论视角的引入^②，劳工研究的学理意义逐渐凸显，但这至多形成了“劳工社会学”这样一个狭小的分支领域，而没能把握到劳工问题对于社会学研究的整体意义。

而与此相反，在中国早期社会学中，劳工问题研究则呈现出一种总体性、综合性的视野、格局和努力，“研究劳工问题的意义不仅在于探询资本与劳动、企业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更重要是将劳工问题放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揭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根源、机制

① 建国以后对劳动关系的治理基本上是统合在单位制的框架之下的，参见路风：《中国单位制度的起源和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总第13期；李猛、周飞舟、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总第16期。

② 参见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闻翔、周潇：《西方劳动过程理论与中国经验：一个批判性的述评》，《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及未来社会建设的可能方案”^①。这个整体性的研究视野至少包括了以下时代问题：第一，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工业化与劳工问题呈现出哪些独特的面向和特征？第二，面对旧式行会的衰落以及新产业工人运动的兴起，如何从“群”的意义上重建工人的组织化路径乃至社会政治参与？第三，在欧美诸国的工业民主体制与苏俄的“劳农专政”模式之外，中国自己的革命与建设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二、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对于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学术遗产，学术界上已经进行了一些整理和研究。现有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科史的编撰。杨雅彬、韩明谟等人编著的中国社会学史教材，可以视为这方面的开荒之作；阎明、姚纯安等人则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将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放置在时代的脉络中进行了考察。^②二是分门别类的文献整理和研究综述。例如，李培林、渠敬东将中国早期社会学分成“唯物史观社会学”“乡村建设与社会调查运动”“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社会学的学院派”以及“社会史研究”等五个部分进行评介；宣朝庆等人则聚焦于1940年代社会学界的社会建设思想进行了专题研究。^③三是对个别学者或学术团体的再研究。例如，对费孝通、潘

① 渠敬东、傅春晖、闻翔：《组织变革和体制治理：企业中的劳动关系》，第8页。

② 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韩明谟：《中国社会学名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姚纯安：《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历程，1895—191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③ 李培林、渠敬东：《导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学术史》，载李培林、渠敬东、杨雅彬主编：《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宣朝庆、王铂辉：《一九四〇年代中国社会建设思想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光旦、孙本文、陈序经等中国社会学早期奠基者的研究一直是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重要议题。^①此外，对魁阁学术群的研究也曾是学术史研究的一个焦点。^②

具体到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劳工问题研究，目前学界对此的关注还比较少。李文海主编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城市（劳工）生活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城市（劳工）生活卷 二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近代工业卷》等收集了民国时期一些重要的劳工研究文献，其中既包括陶孟和、陈达、李景汉、方显廷等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著述，也包括燕京大学、岭南大学等高校社会学系的毕业论文，是一份难得的资料汇编；^③刘爱玉在其编著的《劳动社会学教程》中对民国社会学家关于劳工问题研究的状况做了简要介绍；^④杨雅彬、韩明谟和阎明等学者的社会学史著作中，也都曾经对陈达、陶孟和等人的学术成就做过评述；秦洁则梳理了民国时期关于人力车夫和码头工人的社会调查，且将其放在底层研究的谱系中进行了考察，是为数不多的一篇关于中国早期劳工社会学研究某一方面的述评。^⑤此外，一些历史学者也开始着手对民国时期的劳工问题研究进行梳理，例如田彤对1949年之前学界的劳资关系研

① 例如，杨清媚：《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吕文浩：《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周晓虹：《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刘集林：《陈序经文化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② 谢泳最早对魁阁的学术史意义进行了发掘，参见谢泳：《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更加全面和综合的讨论参见潘乃谷、王铭铭编：《重归“魁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③ 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城市（劳工）生活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④ 刘爱玉：《劳动社会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⑤ 秦洁：《“苦力”：民国时期城市底层社会研究——读〈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开放时代》2010年第3期。